

《红楼梦》——

中国地主阶级的没落史

辽宁大学中文系《红楼梦》评论组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目 录

要把《红楼梦》当作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读·····	(1)
封建“末世”杰出的反儒作家曹雪芹·····	(10)
《红楼梦》——中国地主阶级的没落史·····	(21)
反对孔孟之道的贵族青年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	(49)
反抗封建迫害的女奴们·····	(65)
“机关算尽”的阴谋家王熙凤和 “克己复礼”的卫道士薛宝钗·····	(75)
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	(92)
二百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个战场·····	(107)

要把《红楼梦》当作 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读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号召我们：“在批林整风中，要认真看书学习”，在坚持学好中央规定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还要努力读一点历史和小说。”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一部小说，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地主阶级的没落史。作者曹雪芹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儒倾向。他通过描写处于封建末世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亡史，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虚弱本质，揭露了被反动统治阶级奉为“圣道”的儒家思想扼杀新生力量、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本质；歌颂了敢于大胆抨击儒家思想、反对封建礼教的新生力量及其反潮流的精神。很值得一读。我们要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读，而不要当作爱情故事来读。

为什么应当把《红楼梦》当作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读呢？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

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把历史上的进步小说当作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读，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学遗产的一条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则。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曾说过：“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四一——四二页）对于《红楼梦》这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部形象化的阶级斗争历史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史，也完全可以这么讲。

在阶级社会中，进步的作家的创作实践必然要反映阶级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虽然还没有自觉的阶级观点，写的也不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但是，他站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高度上，用艺术典型，形象地概括了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斗争的反映，写出来以后又推动了反封建的阶级斗争。

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是写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而不是写

爱情故事。他写爱情故事，是为了掩盖所写的政治斗争。

《红楼梦》的前五回，是属于正式展开故事之前的“概括介绍”。作者为了逃避清政府的“文字狱”，说此书“大旨不过谈情”，“不敢干涉朝廷”，“一时有涉于世态”之处都“非其本旨”。但是，他又写了这样两个人物：甄士隐——真事隐晦起来了，贾雨村——假语存，真话不能讲；把他不敢明白讲出的真正创作意图，巧妙地透露给读者了。

在地主资产阶级“红学家”的欺骗下，过去一些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看第四回，而把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作全书的纲。其实，第四回才是《红楼梦》全书的总纲。通过“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作者提出了贾、史、王、薛这煊赫一时的四大封建家族：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红楼梦》写的主要就是这四大封建家族的衰落过程。在这个衰落过程中，充满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激烈的反抗斗争。所谓“葫芦案”，就是开端的小小一例。百万皇商、“金陵一霸”薛蟠，为了争买婢女英莲（应怜），打死了冯渊（逢冤），竟“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自谓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一年之间，应天府地方官吏竟然无人敢于过问此案。而靠贾府之力新任金陵应天府

尹的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了”此案，然后“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报告“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通过这段故事，作者深刻地揭露了豪门贵族和封建官府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幕，揭露了地主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原来官吏就是凶手的走狗，凶手是官吏的后台。四大封建家族在社会上横行无忌，打死了“小乡绅之子”，尚且“视为儿戏”，那些生活在封建社会十八层地狱里的劳动人民，所受的阶级压迫更是可想而知了。作者还特为指出，这种“护官符”“各省皆然”。这就暗示读者，《红楼梦》写的是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政治斗争。

如果我们把《红楼梦》当作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读，它就会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封建社会，了解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就会从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中学到有益的历史知识。这对于我们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中外反动派的阶级本性、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参加批林批孔、反帝反修和批判资产阶级的现实斗争大有益处。如果把《红楼梦》当作爱情故事来读，以满足不健康的好奇心理，甚至是为了欣赏剥削阶级那种不健康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不但歪曲了作品的主题，反而还要中毒。

怎样才能做到把《红楼梦》当作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读呢？这就要在阅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具体地说：

第一，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搞清书中

所写的四百多个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

书中正面写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不多，但写得很多的是封建主子和家奴的矛盾和斗争。这实质上也是地主阶级同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红楼梦》中家奴们十分低下的阶级地位正是这样。他们的根本来源，是由于“生民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饶（富），……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音育 yù，卖）者不可胜数”（引自《东华录》）。袭人就是为了不让“老子娘饿死”，写下了“死契”，卖到贾家为奴的。奴婢们一入侯门深似海，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犹如笼中之鸟。封建主子可以随意驱使、侮辱、惩罚，甚至处死他们。在贾府，一小撮主子不过三十多人，却骑在三百多个家奴头上作威作福，把他们变成了供奉主子享乐的“会说话的工具”。因此，奴婢和主子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贾府内的反映，是两个敌对阶级的生死斗争。

封建统治已经腐朽，但暂时还有力量。这使奴隶阶级发生了分化。《红楼梦》真实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这种复杂性。虽然封建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思想统治，还禁锢着许多奴隶们的头脑，妨碍着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但是在奴婢中毕竟开始出现了晴雯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一批反抗者典型，与此相反，地主阶级的收

买，也造成了袭人之类“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的少数卑劣的奴才典型。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主、奴阶级斗争在奴隶阶级内部的反映。

在贾府不只封建主子分等级、派别，在奴才当中，由于和主子的关系不同，而分成各种等级和派别，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

（《共产党宣言》）小说的主人公、贵族青年叛逆者贾宝玉，正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地主阶级内部的产物。鲁迅曾经深刻指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他看见许多死亡”，“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一精辟分析，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这一原理的。贾宝玉和贾政的矛盾，已经带有新兴力量和反动力量对抗的性质。后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

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地主阶级内部引起的另一种反映，是各派封建势力争权夺利的狗咬狗的斗争，也空前激化起来了。

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贵族青年叛逆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的思想苦闷，也是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激烈斗争的表现，归根到底，还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一切现象的总根源。以上我们指出的《红楼梦》中的种种矛盾，都是阶级矛盾的具体表现。总之，只有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才能搞清《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关系，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读《红楼梦》，才能正确地理解《红楼梦》的主题及其社会意义。过去的新旧“红学家”们，用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解释《红楼梦》，必然“越研究便越糊涂”。

第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同作者和书中人物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划清界限，不受其消极影响。

无产阶级“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传统的观念”，不仅包括曹雪芹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封建思想糟粕，而且也包括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在内。在产生《红楼梦》的时代，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形象，的确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意义。但在二百年后的今天，时代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读者同这两个形象之间，有着根本的阶级区别。这是劳动者同剥削者的区别，这是无产者同有产者的区别。比如，在宝黛恋爱中，有鲜明的阶级烙印，那种贵族青年的病态的呻吟，缠绵悱恻的温情，临风洒泪、对月伤怀的愁思，无休无止的互相试探，都表现了剥削阶级的有闲生活和颓废没落的感情。这些

东西，不是《红楼梦》中的精华，而是糟粕。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加以欣赏。林黛玉抗议封建礼教迫害的诗篇《葬花词》，曾经博得不少小资产阶级读者的眼泪；但无产阶级的读者，却在历史地肯定林黛玉的叛逆精神、同情她遭受封建迫害的同时，批判她的悲观主义，绝不与之发生感情上的“共鸣”。本来，“花谢花飞”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但在林黛玉这位剥削阶级的小姐看来，自己的命运犹如落花的命运，于是发出了“他年葬侬知是谁”的哀叹。我们无产阶级朝气蓬勃，前途无限光明、美好，我们喜爱展蕊怒放的鲜花，更喜欢狂风暴雨的吹打。无产阶级就是在和一切封、资、修旧势力的“风刀霜剑”的搏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青年，决不能向贾宝玉、林黛玉学习。“《红楼梦》里两位主角，一位是贾宝玉，一位是林黛玉。……这两位都不大高明。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够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一九五九年《新体育》第一期）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等问题上，我们无产阶级不仅不能向剥削者学习，而且必须对剥削阶级那一套进行严肃批判！

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无产阶级自己的英雄——李玉和、

杨子荣、洪常青、郭建光、严伟才、方海珍、江水英、柯湘等。这些高大光辉的艺术形象，产生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之中，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尚品德，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完美结合。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才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极少数读者看了《红楼梦》，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消极影响，表现出不健康的思想感情。这种现象，是不是说明各个阶级能够在文艺上发生“共鸣”呢？不是的。“共鸣论”，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对这种现象的曲解。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并不是无产阶级同剥削阶级感情一致而共鸣，而是某些读者头脑里原已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起了作用。当然，《红楼梦》这部书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已经产生了消极影响，那也没有什么可怕。坏事可以转化成好事。转化的条件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红楼梦》当作阶级斗争的历史来重新认识。对中毒的问题要认真地进行分析批判，认清其实质。这样，就会增强免疫力，提高我们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能力。

封建“末世”杰出的 反儒作家曹雪芹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二页）《红楼梦》这部政治历史小说，就是十八世纪中叶我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现实，反映在曹雪芹头脑中的产物。曹雪芹（1715年？——1764年？），这位中国封建社会的伟大作家，他能够写出具有鲜明反儒倾向的小说《红楼梦》，不是他个人“天才”造成的，对这个问题，只有从曹雪芹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和进步思潮中，从他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中，才能够得到解释。

《红楼梦》创作于清代乾隆中叶。清王朝是满族贵族地主阶级同汉族地主阶级相勾结，镇压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而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年间，是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将近百年的时期。

乾隆时期，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曹雪芹生活时代的基本特点，这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产

生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从经济上看，这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稀疏地出现。特别是在曹家连续居住六十多年的南京及东南沿海省份，发展得最为明显。商品经济比以前更加发达，手工业中广泛地存在着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剩余价值的“雇主”和出卖“自由”劳动力的“雇工”。南京地区的纺织业在“乾隆年间机以三万余计”。（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食货志》）这个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还很弱小，却是一个潜藏着重大意义的₁新生事物：“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二〇页）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仍牢固地占据着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八页）高度集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十分严重的封建租税剥削和地主阶级穷奢极欲的经济寄生性，严重地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只能以艰苦的劳作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进程十分缓慢。所谓“近日（按：指乾隆十三年前）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农民“日给之

外，已无余粒”，“一遭旱涝，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既无立锥以自存，又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

（均见《清朝经世文编》）就是当时封建统治者在内部材料中所作的自供状。《红楼梦》所写的“乌进孝交租”（五十三回）、“袭人忆卖身”（十九回）以及贾家“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的种种情景，正是以上所说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艺术再现。

从政治上看，当时主要的阶级矛盾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城市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还处于侧翼地位，但他们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已开始尖锐化起来。这个时期处于两次农民大起义（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高潮之间。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使农民起义结合着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不断发生。如康熙六十年台湾人民以朱一贵为首起兵反清，揭出“官逼民反”的口号，七天之内便占领了全台（《圣武记》卷八）。又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在寿张起义，接连攻克堂邑、阳谷，占据南北交通要道的临清。当时给事中李瀚芳的奏折里说，是由于“山东吏讳灾不报，反加征激变”造成的。此外，如乾隆时台湾天地会的起义，哥老会、白莲教及其支系八卦教等秘密组织和其它反清活动，彼伏此起，连绵不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御用封建文人笔下的所谓“乾隆盛世”，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红楼梦》的第一回写到：“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抢田夺地”（庚辰本），就透露了农民被迫起义，以暴力打击封建制度的消息。

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激化起来。这集中表现为康熙诸皇子争夺皇位的斗争。他们各树党羽，谋夺嗣位，互相残杀。雍正上台以后，继续用各种手段打击他的政敌党羽，康熙的亲信和奴才，也都在扫荡之列。曹雪芹的家庭就是在这场地主阶级内部的政争中跌落下来的。正因为曹雪芹生活在这一斗争漩涡之中，所以《红楼梦》描写地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非常深刻精采。

“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七页）这一时期，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统治，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对孔孟之道的批判，都带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新特点。从南宋以来，孔孟之道的正统发展为程朱理学。这具封建思想僵尸，直接为反动封建政治服务。集儒学之大成的朱熹，竭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他所谓的“存天理”，就是“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也就是主张三纲五常等封建统治秩序万世不变。他所谓的“灭人欲”，就是要人民忍受封建统治的任意宰割，就是把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宣布为非法的东西。因此，清王朝统治者把朱熹

抬入孔庙，捧为“十哲之次”，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和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并通过八股取仕的制度，向全国强制推行这种反动思想。与此同时，统治者还采用极其野蛮的镇压手段，文字狱就是其中的一种。清王朝在文化上就是用这种镇压与麻醉相结合的政策来维持统治的。

但是与封建统治者愿望相反，处于总崩溃前夜的封建社会，蕴藏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是出现了与封建思想相对抗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巨大动乱中，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杰出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由于受到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城市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可贵的观点。如黄宗羲大胆抨击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并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论点。颜元提出了平均土地的主张：“宜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存治编》）这些人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已经触及到了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些根本问题，在当时反封建斗争中，代表着进步的思想潮流，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作用。当然，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还只是初步的，萌芽状态的。他们对于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例外地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都还没有突破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

比顾、黄、王晚出的几位文学家蒲松龄、吴敬梓、曹